

书香中国

一部关于焦裕禄前世今生的全书

——评高建国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河初心》

□汪守德

高建国用了整整3年时间,写出了《大河初心——焦裕禄精神诞生的风雨历程》(作家出版社)这样一部长达58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捧在手里阅读时能让人掂出其磅礴厚重的分量,也许有人会问,焦裕禄作为被宣传了几十年的典型模范人物,他的事迹早就尽人皆知了,还有什么可写的呢?本书的作者会不会只是对焦裕禄的事迹再进行一次更为完备的重述呢?当我认真读过这个大部头的作品之后,深感作者在写作上的用功之深,深感我们对焦裕禄这个现象级的典型模范人物的知之甚少,假如将关于焦裕禄的一切比作星辰大海的话,我们一般人知道的也许只是夜空中的几颗明亮星星,或者是海面上飘动的点点白帆而已。《大河初心》无疑是一部描绘焦裕禄前世与今生的全书,是一部探索共产党人可贵初心和成长历程的著作,值得广大的读者用一些时间去仔细地读一读,认真地想一想。

加入到报告文学创作阵容的高建国,虽然从时间上讲并不算很长,却是一位有扛鼎之力、能揽大活的作者,一出手就不同凡响。如其力作《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以如椽之笔大幅度地刷新了我们对新四军以及“江抗”所经历的艰难残酷斗争,对从沪剧《芦荡火种》到京剧《沙家浜》这一经典所具有的自然而又复杂发展演变过程的历史认知,庶几让我们领略到了他的既是史家又是作家的见识与文风。这部《大河初心》显然是又一部让我们备觉精彩、大感意外、值得重视的报告文学佳作。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不免好奇与想象这样一个问题,即高建国为什么要选择焦裕禄这个人物来进行自己的书写?当他走近和走进焦裕禄这个人物和题材时,有着怎样的目标与准备,有着怎样的思考与冲动,又为此做出了一番怎样持之不懈的艰苦努力?要完成这样一部主题重大、内涵丰厚而且篇幅较长的报告文学作品的高水平写作,详尽的采访,精湛的立意,宏大的结构,生动的细节,精妙的文字,应该都是不可缺少的,否则很难支撑起如此体量和气象的作品。

让我们印象尤为深刻的,是高建国对这一题材曾经的契人和后来的采访。他曾驻军河南十几年,执行过去兰考搞教育、抗洪抢险等任务,与焦裕禄的子女有过交往,收集了部分富有价值的素材,这足以表明他对写这个题材留意存心已久。离开后他又怀着极大的热情16次重返河南,进行踏破铁鞋式的寻访,将能走到的地方都尽量走到,能找到的当事人尽量找到,以不厌其烦、不辞劳苦的姿态争取重返历史岁月和现场,抵达人物与事件的那些原点,去感受、观察或遥想那些重要的事实、过程与场景。他绝不放弃任何一点生活的蛛丝马迹,也从疏忽任何一点历史的针头线脑,以至有的细心与执著,对相关的历史原貌和细节进行反复的锁定、甄别与核实,来进行对人物与行动的爬梳、鉴别、追问,确定与凿实他所希望了解和掌握的一切。这是一种对焦裕禄事迹所进行的拉网式的采访与打捞,力图在最大程度上还原历史和人物,从而使逐渐逼近和再现真实的历史和人物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高建国怀着一名共产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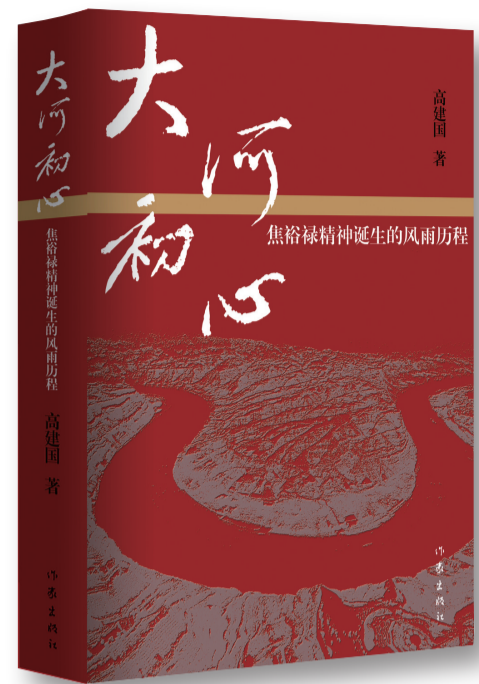
对焦裕禄发自内心的尊崇,以一位史家认真严肃、缜密细致和一丝不苟的严谨,抱持对历史负责、对人物负责、对读者负责的态度,进行了感情充沛、酣畅淋漓、灼烫人心的文学书写。

在深入采访的过程中,高建国发现和了解了焦裕禄大量不为人所知的经历、故事和细节,而这些都是过去的新闻、文学、戏剧、影视等各类作品所不曾深挖或未曾涉及的,因而也是其存在的明显不足或缺憾。但这却给高建国完成《大河初心》的挥洒与写作,保留了巨大的生活空间和强有力的史料支持,于是我们看到作者将笔触沿着焦裕禄的生命与革命的轨迹大大地向前延伸,描写了焦裕禄饥寒交迫的贫寒家庭出身,误打误撞曾涉伪军部队的事实,于烽火年代的听从召唤投身革命,南下路上担纲演出《血泪仇》,落脚尉氏后同土匪斗智斗勇,情感与婚姻生活所经历的困顿与顺遂等等。同样曲折、复杂和丰富的还有新中国成立后的经历,突出地反映出焦裕禄服从大局、跨越三城的惊险跳跃,热心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种种出色表现,如从幕天席地的开路先锋,到一个乡巴佬成为最棒的车间主任,从搬掉知识分子身上的“石头”使其迸发出巨大能量,到睡板凳带领人们攻坚克难实现中国首创等等,作者向读者描绘的,是焦裕禄一路向着光明、向着前方昂然行进的闪光足迹和光荣历史,是焦裕禄时刻听党召唤、服从大局、积极肯干、努力奋斗的优良品质和精神风貌。作品将焦裕禄的这一切“前史”深挖出来和连贯起来,揭示出焦裕禄之所以成为焦裕禄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既令人明了其后果也知晓其前因,清晰认识焦裕禄是从中国这块土壤上诞生的,尤其是从现代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历史中诞生的人物。作品同时告诉我们,焦裕禄不是一个天生的马列主义者,也有着自我的成长道路,有着各种的曲折和挫折,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有着一般人可能具有的缺点和错误,让观众看到书中的焦裕禄才是完整的、立体的、丰满的焦裕禄。

作品还以高度写实的详尽笔墨,真实描述了焦裕禄担任兰考县委书记的复杂过程,从其由洛阳矿山机器厂到尉氏县委任职,从因名列县长之前、书记之后被称为“一点五书记”到代理兰考县委书记第二书记,再到被任命为兰考县委书记一年多的短暂时间,这种曲折而又有些玄妙的“仕途”变化,并不影响他作为领导干部为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所表现出的那种义不容辞、尽心竭力的务实作风。如风雪之夜他在车站送乡亲们出外逃荒而不是制止,反映出他对民众的体恤同情和实事求是的精神;那一辆非利普牌自行车载着他下乡,走村串户地在乡间崎岖的路上颠簸;踏遍全县绝大多数生产大队搞调查,说“吃别人嚼过的

馍没味道”;带人深入宽达十几里甚至几十里的风沙漫天的黄河故道,亲手掂掂“三害”的分量,以实地寻找防沙治沙的有效方略;大张旗鼓地表彰伏水锁沙的“四面红旗”,鼓励和促进更多的力量投身到同大自然的斗争中来;喊着爹叫着娘地竭诚为老百姓服务,被老百姓发自内心地称为“儿啊你可是共产党的好官啊”;忍着疼痛的折磨用膝盖顶着肝部坚持工作,“直至化作胸啼带血归”等等,作者笔下所呈现的焦裕禄的事迹不胜枚举。虽然被肝癌折磨得死去活来,但焦裕禄出于肩上的责任而不愿意离职去休养,痛楚使这个坚强的人在床上蜷曲成了“句号”,沉疴之中的他仍然想着如何节省医疗费用,想着兰考的各方面的工作与建设。焦裕禄生命的最后时刻,是作品最富含温度、令人揪心的描写,将这位平凡却伟大的人物去世时的真实情形和悲伤气氛,仿佛发生于昨日一般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令人被文字所传达的巨大力量所震撼,使人感到这一刻既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自然生命的终点,却又是其生命与党性的高光时刻,更是对共产党人应有初心的最好诠释与写照。虽然有些方面的内容早见诸以前的文字,但高建国的叙述则更为生动、深刻与周详,跃然纸上的是一个以身许党、勤政为民、鞠躬尽瘁的焦裕禄,一个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能经受委屈的焦裕禄,因此也更加撼人心魄、催人泪下和发人深思。

高建国对于焦裕禄的追寻与写作,不只在写了其前世,还在于写了其今生,也即同样具有审视与思考价值的是后焦裕禄时代所发生的那些事儿。作品告诉我们这个影响了全国几代人的典型人物的精神“诞生”,经历了怎样复杂曲折、甚至令人费解的过程。穆青等人作为新闻工作者基于职业敏感、政治判断和社会良知,撞大运般地抱了个“金娃娃”,经过种种倾费周章的斟酌与运筹,冲破种种明里暗里的阻力,石破天惊地宣传出焦裕禄这一时代的人物。而一些人则出于偏执狭隘的胸襟与见识,给焦裕禄的宣传工作设置了诸多的障碍,让人感到一个富有的典型能够宣传出来,并且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是多么的不易。高建国没有讳言和回避而是直视了这些曾经的事实,并且从党性与人性的双重角度去进行了忠实的描绘和深刻的揭示。这样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把曾经的历史与真相记录下来,告诉后人,使人们看到的是时代的某种背影,历史生活本身应有的复杂性和多重性。然而即便远离了当时的年代,高建国也仍然非常注意叙事的策略与分寸,充分显示出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既有直面事实、秉笔直书的非凡勇气,反映和把握重大政治问题的勇气和担当,也显示出一个成熟作家的稳



健和老到。对焦裕禄家人及后人的反映,自然也是后焦裕禄时代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也是读者颇为关切,同样具有观照价值的重要方面,作品对此也用了大量的笔墨。因为生活在焦裕禄光环之下,其影响所及使之既作为普通人,有着人间的油盐酱醋和喜怒哀乐;又不可能完全像普通人那样过着平静无扰的生活,而是时常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看似关乎焦裕禄必然具有的余波或余绪,但实际上又是一种有着巨大人生意味的社会政治生态。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其他国家领导人对焦裕禄及其精神的关注,以及广大的干部群众因焦裕禄而移情于其家人,作品都有非常真实的反映。而作品透过她们的种种处境与遭遇,即通过妻子徐俊雅对演员扮演焦裕禄的排斥,通过女儿焦守云对观看电影《焦裕禄》时从电影院奔出去的痛哭,折射出她们对丈夫、对父亲的深情缅怀,让人品味出其中饱含的无尽滋味,也让人不免感慨万千、悲从中来。

我们或许并不完全知道作者究竟是怀着怎样的一种心情来写这部书的,或在写作的过程中又经历了怎样的心理过程,但我们能够感觉到作者投入其中的倾向与倾情,以及饱含在作品中的可以触摸到的写作匠心与气韵。本书的描写似是紧贴地理上的黄河,但更为磅礴奔腾的是党的发展历程和精神大河,其以烽烟、征尘、钢屑,以浪花、风沙、桐叶为背景的焦裕禄,虽然看似平凡普



《春夜》后记

□蔡骏

《春夜》最早的灵感,来自芬兰大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Aki Kaurismäki)的电影《升空号》。前几年,我开始系统地看考里斯马基的电影,1988年的《升空号》是一部工人题材文艺片,主角是个芬兰北方拉普兰地区(位于北极圈内,传说中圣诞老人家乡)的矿工,失业后意外得到一辆白色凯迪拉克敞篷车,这车因为老旧,车篷无法升起。这个失业的男人只能独自驾车,扎着头巾御寒,四面透风敞开着,疾驰在大雪纷飞的北欧旷野,背景音乐响起,一个芬兰男人深情歌唱。这首歌叫《Valot》,我查了一下,芬兰语意为“灯”。借此情景,此车此声,如一道电光,点燃了我内心的灯。

我便想出一个故事,名叫《我的诺基亚女友》。芬兰出产诺基亚,世人皆知其坚固耐用,我便设想若是诺基亚还生产汽车,小众的敞篷跑车,怕也是长命百岁。若有一个中国的修车工人,意外得到一部诺基亚牌敞篷车,下班载着浑身机油的工友们,要么载着下夜班的女郎,倒是颇具后工业时代之风情。

我又想起少年时候,我爸爸上班的工厂亏损严重,工人们大半下岗回家,唯独我爸爸坚守岗位,每日上班打卡。彼时,我有一个徒弟,估计是临时工,年龄应当与我相仿。我刚买了第一台电脑,某日我不在家,

我爸爸带着徒弟上门,安装了一款单机游戏,好像叫《横扫千军》。那一年,我和爸爸曾一起玩这款游戏,但我从未见过他的徒弟,后来也没有再听他提起过。我爸爸所在的上海第三石油机械厂,在2002年前后灰飞烟灭,工人们各奔东西。我爸爸去私人老板的工厂上班,但并未买断工龄,而是保留国有企业身份,后来正常退休,也算功德圆满。

时隔多年,我忽然意识到,这个销声匿迹的徒弟,与我从未谋面的同龄人,因为我爸爸的缘故,已跟我构成了某种变异的兄弟关系。这关系无关于血缘,而是来自于历史,来自于一个消逝的时代,来自上海与苏州河畔的记忆。小说

中关于我自己的经历和我的父母,大半属于非虚构,某种程度而言,可说是我的家庭自传,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变得尤为模糊。

2018年9月起,我开始写这部小说。10月初,我去了一趟法国,因为我的《生死河》法语版在巴黎出版,我便决定再加入海外有关情节。前后写了一年左右,主人公张海的面目一点点清晰起来,故事从一个春夜开始,到一个春夜终结,见识过巴黎圣母院的烈火。其间许多个春夜,犹如春天的露水,湿漉漉,黏糊糊,欲说还休,欲断还留,仿佛一张宣纸上的墨迹,慢慢化开晕染。

终于,我把书名定为《春夜》。本书的语言和腔调,最后一章已有详细交代,不复赘述。我以悬疑小说出道,当然还会继续写下去。《春夜》中的悬疑元素比比皆是,本书却称不上是悬疑小说。“托梦”竟成了某些情节的推手,比如张海夺回外公遗产,亦可算魂灵有道,善莫大焉。川沙古宅的“莲花奶奶”显灵,亦是此例。青花瓷大瓮缸,首一尾,一男一女,肉身不灭,封印于一百年光阴,大致也是我惯用的风格,却与《春夜》构成混血的杂糅,克里奥尔般的繁衍。张海归来了,故事没有尽头,因为生活没有尽头,历史没有尽头。

(摘自《春夜》,蔡骏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

伟大的个体

——《人间光亮——武汉生命记忆》读后记

□胡一峰

每一个经历过庚子年之春的人,都不妨读一读作家出版社的新书《人间光亮——武汉生命记忆》。随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战的硝烟逐渐散去,武汉、生命、记忆、人间、光亮……以前熟悉的这些词,正以另一种方式进入我们的思想和生活。

是无数个体,帮助一个群体度过了灾难

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是一场灾难。人们常说,灾难书写要关注人性。但人性从来不是抽象的,当它与灾难联系在一起时,就更是如此。如果只是在理论甚至口号的意义上谈论灾难与人性,人性就会化约为几个苍白概念,一如灾难被谈论时的遭遇一样。《人间光亮》共分为三辑。辑一“武汉现场”记录了普通人的抗疫故事。他们中有战斗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有抢运物资的飞行员、大卡车司机、医疗物资销售,有冒着感染危险毅然逆行的志愿者,有在灾难中燃灯前行的作家艺术家,还有英雄的武汉市民。书中收录的文章虽多以第三人称写就,却保存了大量亲历者的口述,读之如临其境,感同身受。

电视剧导演邵进滞留武汉后,和他的剧组一起成为了志愿者,付出心力来守卫这座生命中偶然相遇的城市。摇滚青年阿森和他的乐迷朋友,当城市按下暂停键后,以属于他们的朋克方式,成为社会网络的超级节点,仿佛一块柔韧的缓冲带,在短暂的真空期,维持了城市末端的正常运转。卡车司机王晓伟和他的同行,冒着风险,把抗疫和生活物资运往武汉,他们像一粒粒微小的红细胞,奔走在血管中,为生活凡人提供补给。正如书中所言,“假如现实的救援行动是垂直的、集中的,他们的行动则更像是集市的:并行的、点对点的、动态的。在集市模式里,人与人之间仅仅依靠互联网连接,在貌似混乱而无序的环境中,依然可能产生巨大的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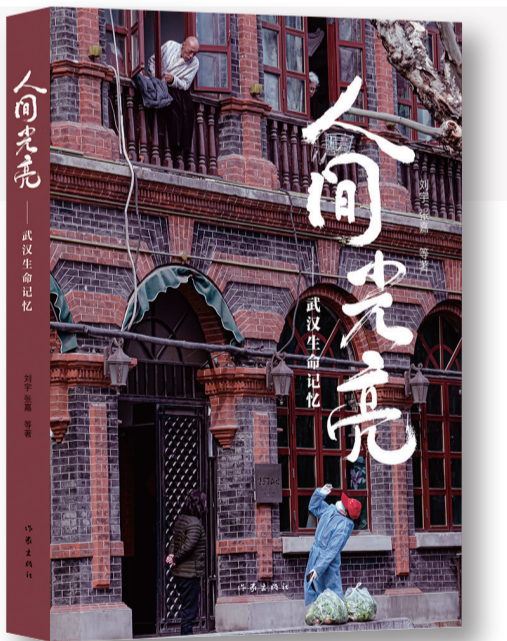
被守护的武汉市民,也以这座城市特有的乐观、豁达和坚韧,守护着热气腾腾的市井生活,“菜市场挪到了线上,他们每天的生活从买菜开始——这成了一件大事:在团购群里、生鲜APP上、买菜接龙程序上,分享菜谱、菜单。原本被忽略的很多细节,重新回到生活的中心”。好好吃饭,好好活着,在悲欣交集集中迎接已在路上的真实生活。这些记录,从每一个单篇来看,或许只是疫情日常以及抗疫斗争的一块小碎片,但却是可以黏成一幅完整图景的碎片。而在这幅史诗般的图景中,闪烁着伟大个体的

毫光,正如书中引述的那位导演的话,“综观人类历史,每个惨剧为什么最后能过去,都是因为个体的伟大。是无数个个体,帮助一个群体度过了灾难。”

野草般的善意,让城市的神经末梢维持了活力和温度

《人间光亮》的辑二和辑三分别是“守望相助”和“听见·爱”。在辑二中,我们读到,天津的社区工作人员杨璐常以五位数的微信步数数雄踞榜首,他的“手指关节敲门敲疼了。有的门要敲很多遍,里面电视声吵闹,听到门外自报居委会,马上陷入安静”,这无法虚构的细节揭示出基层防疫的艰辛。健身教练辛野则成为了一名骑手,专挑那些不被注意的订单,骑着共享单车,爬坡上桥;天门姑娘肖亚星把自己经营的酒店贡献给医护人员免费住宿;上海女孩梁钰呼吁关注一线女医护,发起“姐妹战疫爱心行动”;在杭州经营小型酿酒厂的未巍,在新西兰从事旅游工作的嘎子,尽其所能地筹集口罩、酒精和卫生用品等,送往需要的地方。疫情让城市中散落的个体拥抱在了一起,也让沉潜的善意如野草般悄然滋长,并终于蔓延开来、缠绕起来,连成了一片,构成了托举胜利最靠谱的力量。

“辑二”中有一组文章是属于文化人的,陈平原、夏晓红、赵筠、赵衡、止庵、韦力、曹可凡、黄永玉、周星驰,其实还有“辑一”中的李修文、李舸。“辑三”还收录了若干篇池莉、陈先义等的文字,扫一下书中所附二维码,就可以听到濮存昕、杨立新等的倾情朗读,以时尚的网络方式,丰富了抗疫叙事的层次性和感染力。作为思想者、学问家、作家、艺术家,对于现实及其发展趋势,他们往往有更敏锐深刻的洞见和感受,也有更娴熟地记录和讲述技巧,让我们读到了疫情期间理性、镇静的声音。与此形成比照的,则是疫情期间去留两难的“湖北人”。有一位和闺蜜约好去吉林滑雪的武汉女孩说,“我经历了27年来做梦都想不到的经历:一家接一家的旅馆不能入住,自己有家却不能回。从东北流浪到西安,最后住进西安一家愿意收留的小旅馆里,随时担心再次失落街头”。从武汉回到河南老家的陈方宇,每天打开手机上百次,亮屏时间在12小时以上,他不断获取关于武汉的消息,即便帮不上什么忙,至少可以通过拍照片和视频传递一些信息,“我希望我还是在武汉,跟所有人一起战斗”。这些普通人的感受质朴得有些“粗暴”,但同样直击人心。



从抗疫的宏大叙事来看,这些感受或许过于个体化了,在“大道理”的支配下甚至有些偏颇。然而,叙述意图的模糊,反而为记忆的可靠提供了背书。正如S.A.阿列克谢耶维奇曾说过的:“我时常觉得,简单和呆板的事实,不见得会比人们模糊的感受、传言和想象更接近真相。为什么要强调这些事实呢,这只会掩盖我们的感受而已。从事实当中衍生出的这些感受,以及这些感受的演变过程,才是令我着迷的。我会试着找出这些感受,收集这些感受,并将其仔细保护起来。”《人间光亮》便为我们保存了这些珍贵的、难以虚构甚至无法想象的感受,让我们真切地感到疫情确实是一场大考,不仅考验国家应急体系和能力,也考验人心的承受力和包容力,同时又提醒人们完整地看待这场灾难,避免化约式叙述和理解我们共同经历的生活。

如本书封底所写的“当社会秩序渐趋正常,这些在武汉内外、线上线下活跃的个体行动者,如涓涓细流,汇入大海后便不可辨认”,多少年后,回首往事,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或许只是史书上的一段简练的文字,或是报表中一串枯燥的数字,好在有《人间光亮》这样的书,全景式地记录了疫情中的生活和人,记录了疫情中“狭路相逢”的爱情,延期上课的孩子和家,这或许是再也不会重来的昨天,它也可能成为常态化的明天。疫情终将过去,但它带给社会以及个体的影响,却将持续下去。书中引述了画家赵薇写于2月16日的一句诗“今天应该怎样度过/才配得起这经历的非凡?”这,正值得我们每一个经历了2020的人认真思考。